

 宁夏诗歌学会丛书

宁夏诗歌史

杨梓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宁夏诗歌学会丛书

宁夏诗歌史

杨梓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诗歌史 / 杨梓主编.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525-1785-9

I. ①宁… II. ①杨… III. ①诗歌史-宁夏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072487 号

宁夏诗歌史

杨 梓 主编

责任编辑 赵维娟 谢 瑞

封面设计 黄河梦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183

开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25.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1785-9/I·554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地方书写的意义

耿占春

我对历史书写者常常怀着一种敬畏之感，这是因为历史书写需要刘知己所说的“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说史家三长“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所以又说“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而《宁夏诗歌史》的令人信赖之处在于，主编杨梓不仅是宁夏本土诗人学者，他还曾以诗歌的方式书写过大部头的《西夏史诗》，于史于诗对宁夏都有深入研究。而说实话我是没有资格写这篇序文的，无论是宁夏历史还是具体到诗歌史，都是一个知识盲点，但对我来说这是认识和熟悉一个地方的一种方式，又能够借此接触过去了解较少的知识领域，所以愉快地接受了杨梓友好的提议，怀着学习的机会写一点与《宁夏诗歌史》相关的读后感，也以此就教于杨梓和本书十多位长期生活写作在宁夏的诗人和研究者。

笼统地看，20世纪后半期以降，大陆文学研究界经历了三次文学史写作，即80年代之前占主导的“左翼文学”叙述，80年代中后期力图恢复文学主体地位的启蒙叙述，以及新世纪以来开始慢慢形成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叙述。前两次叙述可以在更早的胡适、郑振铎、茅盾等人的文学史叙述中找到踪迹，五四之后无论是自由叙述还是左翼叙事，都反对传统文化。前两次文学叙述的历史语境都难免意识形态的支配，第三次叙述则是在回归文学自身的历史属性这一意图中展开的。《宁夏诗歌史》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第三次文学史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

地方文学史写作一方面致力于梳理出地方文学自身的历史线索，描绘

出一种地方文学的历史地貌，通常情况下它还需要处理地方与国族文学的关联。《宁夏诗歌史》的叙述框架仍然是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鸦片战争到结束于40年代的“近代”以及1949年至今的“现代”，在每一文学史分期之前，编撰者都会给出相应阶段的“中国文学史”背景作为参照，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连续体。地方性文学史的书写分享了与国族文学史相同或相似的叙述框架，但在内容上又有很大不同，它不仅是国族本位的，还是民族文化本位的，民族成为诗歌史叙述的基本“单位”及其较为稳定的话语特质。可以说《宁夏诗歌史》的写作非常自觉地处理了这一领域的问题。同时，本书也充分注意到，对于宁夏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较早开始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地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夏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相通共融，并展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写作线索。“宁夏诗歌史”是一个笼统的称谓：从时间跨度看，从唐宋夏元一直到“90后”的宁夏诗人；从诗人分布看，不仅有生活在宁夏的宁夏人和外省人，也有客居或定居于其他省市的宁夏人；另外，宁夏的回族诗人也以汉语写作，“宁夏诗歌史”实际也是一部“宁夏汉语诗歌史”。

在此意义上，《宁夏诗歌史》的写作充分注意到地方性诗歌写作与中国诗歌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与“转型”问题。如同该书主编杨梓在《跋：执毫品塞上，舞墨言春秋》中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情景结构”传统不同于西方诗歌的“情事结构”传统，而现代诗与古典诗词之所以会出现断裂，正源自前者对古典诗词“情景结构”的放弃而继承了西方诗歌“情事结构”的传统。杨梓并且提出一种预言，“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回望以‘情事结构’为主的现代诗的发展，因为背离了中国诗歌的‘情景结构’传统而不会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因为结构之于诗，如同骨骼之于人。”这是本书主编杨梓的一种深具个人史识的总体判断，但因本书又是一次集体写作，写作者在视野、认识、判断上会有参差，不一定每个部分都体现出统一的认知。

关于地方诗歌史的总体构想与论者之间的视域差异，也容易构成叙述上的散点透视，带出诸论者更多的意识和无意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文学史尤其是地方文学史的写作。或许可以尝试将“情景结构”和“情

事结构”一道纳入诗学范畴，事实上亦是如此，如在论及杨建虎较多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时，论者则担心其“缺憾在于似曾相识的古典与婉约，在扩展了他诗歌影响力的同时，也覆盖他的原创力”（第四章第二节第223页），不因其保持了“情景结构”而放弃批评意见。与此同时，《宁夏诗歌史》中所描述的70年代以后的写作则更加注重叙事性，即普遍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书写，其实不唯70年代如此，50年代的骆英和60年代的杨森君、梦也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小努力，他们以具有方言意味的“情事结构”的叙述，彰显了没有抒情性可言的小人物所承受日常生活中的历史重负。对这些诗歌写作的阐释似乎可以搁置诸如“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这样的国家修辞，正如论者所说：“发轫于9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个人化叙述，使现代诗歌走下神坛，日常生活入诗，口语化写作，最大的意义在于拓宽了诗歌的创作空间”（第四章第一节第169页）。

作为一部地方诗歌史书写，在保持着国族历史叙事的参照，尤其是历史和时间参照的同时，《宁夏诗歌史》的叙事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诗歌写作的地方文化特性，西部，塞上，西夏，回族，这些地方性的因素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这一地方性在《宁夏诗歌史》论及70后诗歌时亦有明确论述：当全球化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时空压缩”导致“无地方性”的城市诞生；《宁夏诗歌史》的书写自觉地强调“诗歌‘在地性’的形成”，“让诗歌具有‘在地’中国、‘在地’宁夏的品格”（第四章第二节第209页）。这些论述显示了该书主编和诸位编撰者的基本共识。问题可能在于将地方性与日常生活分而治之，也就是将地方文化去历史化或抽象化（就像将民族文化本质化一样），抽去其中可分享、可传递的物质生活细节，而以一种强制性的姿态占领某块高地：“于是地域、本土等词汇在日常性、经验性、个人化等词汇之后，成为诗人与诗人之间创造异质的关键词”（第四章第二节第209页）。这也是《宁夏诗歌史》的编撰者所意识到的隐忧。地方性、日常生活和语言曾经是当代诗歌摆脱国家话语宰制的一个基本杠杆，但是现在，国族叙事又可能借“地域”、“本土”这些往往已僵化为本质主义的概念暗度陈仓。如何根据日常生活的压力结构创造出一个区别于国家话语、既忠于个体感受又能与共同体的共通感进行对话的地方性社会空间，这可能是很多诗人和书写者所面临的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

《宁夏诗歌史》的编撰者们已将这一论域展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

源于诗歌或文学的特质，文学史写作需要一条或多条线索，或者说需要一种非线性的叙述，如前所提及的，《宁夏诗歌史》有两条线索比较明显，一是历史分期及历史事件参照框架上的国族叙事，二是诗歌艺术表现形式与特质方面的地方文化叙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易事。前者如1957年张贤亮因之获二十二年劳教之灾的长诗《大风歌》，再如肖川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诗歌《这巍巍山这沉沉瀚海这厚厚土壤》，诗中的个体融入了国家，论者指出他们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变革运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时代风尚和美学风范”。据此反观，《宁夏诗歌史》的叙述立场不同于威廉姆斯《剑桥美国文学史》中以“西部方言”对艾略特“遵从着课堂英语精华”的《荒原》提出质疑，也不像威廉姆斯那样严格区分文学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如在谈到屈文焜和回族诗人高深时均认为“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不仅把海瑞（《我默立在海瑞墓前》）看成是回族的光荣，“更把他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虽然“本土性”和“民族性”都是历史的生成，但后者往往因为国家的介入落入文化本质主义的论述，“天人合一”的阐释背后亦常常有着隐蔽的“国身通一”的权力支撑。在论及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桷《黄沙古渡》时作者亦认为诗中所描写的“无垠的黄土，无尽的黄河，风雨滋润着大地，湖水微波荡漾，汀州绿草茵茵。这一切都在衬托一个主题，那就是‘万里边夷朝帝阙’”（第一章第二节第019页）。国族意识很容易吸取其悠久的帝国传统，成为一种主动建构的或无意识的“东方主义”，使得一种地方性叙述的意义为一种国族叙事所冲淡。

地方书写既需要有国族叙述的参照，更需要跳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国族叙事框架，以进一步彰显出地方的、本土的以及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乃至进一步深入诗歌创造的个体属性。就此而言，地方性文学史书写依然存在着的某种封闭性或许并非是地方性自身所致，而是国族叙事对地方性的笼罩造成的。周作人于1932年在辅仁大学所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中，他质疑了韩愈尤其是宋明理学以来愈加浓重的载道主义，以非线性的文学史模式回应了实质上是载道主义后裔（桐城派）的胡适和陈独秀的线性文学史观，给予地方而非民族以优先地位。30年代的民族思想语境

自然非常特殊，这里存而不论，但就文学史的书写而言，在基于共享文化的地方性书写中，线性时间的缺席，美学趣味与风格的多样性，确实可以创造出一种与国族文学的线性历史叙述截然不同的视野。在这方面，《宁夏诗歌史》的阅读让人尚存意犹未尽之感，或许正像历史本身并非一种完成了的认知客体一样，地方史的书写在史观、范式、体例都尚且走在探索的途中。

一部诗学观念多元而文献浩瀚的《宁夏诗歌史》所作出的贡献、所揭示的论域远不止这些，在编撰者总揽宁夏诗歌史的整体景观之际，在今古诗歌佳作之中的逗留之时，他们既提供了植根于一种感性经验的地方史书写，又体现出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在地性”的认知。这是一部通过感性、感受、情感所勾画的地方史，又是通过地方性经验的表达所呈现的一部宁夏人的“心灵史”。正是诗歌史中的感性经验的演变、情感的顿挫、某种独特感受性的形成，揭示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历史，它是一个地方的物质生活史下面涌动着的连续又断裂的内心生活史或社会心态史。

2015年2月25于海口

目 录 contents

001	导论：抒写地域而歌咏民族的宁夏诗歌
010	第一章 古代：塞上诗词中的雄浑与秀丽
012	第一节 唐宋夏元：烽火台下孤独的背影
018	第二节 明代：从想象到亲历的逐渐丰富
031	第三节 清代：集大成的风情面貌与艺术特质
048	第二章 近代：一条并未断流的诗歌血脉
048	第一节 动荡之外的蛇行小溪
063	第二节 偏远区域的点滴蓄积
067	第三章 现代：贺兰与六盘间的潺缓歌吟
067	第一节 政治与生活、民歌加古典的共同影响
087	第二节 西部诗歌：地域抒写的强劲展开
102	第三节 个体化：回到诗歌本身的艰难肇始
119	第四节 回族诗人：并肩耕耘于塞上大地
137	第五节 古体诗词：繁星璀璨映心灵
153	第六节 《朔方》：诗歌生态的核心园地
163	第四章 新世纪：黄河富宁夏的枝繁叶茂
163	第一节 60后诗人：独具诗美意味的一支劲旅
205	第二节 70后诗人：因被遮蔽而奋力突围
236	第三节 80后诗人：勇于张扬个性的青春景象

250	第四节	回族诗人：倾情渲染民族特点
279	第五节	女诗人：长河两岸的四季芬芳
304	第六节	诗歌评论：鸟之一翼亟待丰满
333	第七节	绿色诗歌：从西部边陲走向全国
350	附录：诗坛纪事	
393	杨梓 / 跋：执毫品塞上，舞墨言春秋	

导论：抒写地域而歌咏民族的宁夏诗歌

宁夏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一个多种文化形态相通共融的区域。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是三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圣地，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秦汉时期，被称为德水的黄河，经过秦渠流向宁夏平原，将荒地旱原变成塞上江南，“天下黄河富宁夏”不仅是黄河开辟的巨大工程，也是宁夏人民创造的光辉诗篇。从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原农耕文化就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唐宋时期，“安史之乱”后，唐太子李亨在宁夏灵州登基，尊玄宗为太上皇，布于天下；同时，丝绸之路将伊斯兰文化逐渐引入宁夏。以党项族为主、以兴庆府（今银川市）为国都的西夏王朝立国 189 年，而政权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银夏（今陕北）到明正土司嗣斩而绝的木雅（今四川康定）存在 819 年。宁夏之名始于元代，取西夏灭亡“夏地安宁”之意。明清时期的宁夏，是中央政府用心经营的地方，大批中原人和江南人或移民或滴成或流寓宁夏，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深厚和江南文化的秀丽。

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古代的宁夏社会以农耕、放牧、通商、战争为主，表现在文化上一直具有从相互了解到相互认同的多元多姿的特点，这也是移民地区的特点。生长于塞上大地的民众前几代也是移民而来，新移民到这里的民众只能把塞上当作自己的家园，而且每个民族的人数都没有绝对优势，便不可能对其他民族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除了蒙古与党项之外。虽然农耕文化、黄河文化、游牧文化、丝路文化、伊斯兰文化、

西夏文化等各种文化异彩纷呈，但都学习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来之，则安之”，原意是“既然他们来了要把他们安顿好”，指的是政府；但民众理解为“既然自己来了要安定下来”，塞上就是他们的家园，所以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各族人民都能和睦相处，形成了南北认同、东西交融，既有北方之雄浑厚重又有江南之清秀柔美的鲜明特色的塞上文化。而这种独特的塞上文化无疑为以后的宁夏社会和宁夏文化奠定了基本的精神底色，同时也为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深厚的精神资源。毋庸讳言，宁夏虽然地处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偏远之地，但宁夏从来不缺乏文学创作的矿藏。相反，一个历史时期的苦难历程和物质生活的相对贫乏，反倒催生了文学无边的想象与真情流淌的歌唱。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北朝乐府民歌），“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卢照邻），“蝉鸣桑树间，八月萧关道”（王昌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韦蟾），“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李益），“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张舜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马祖常）等等，中国诗人在塞上大地留下诸多名篇佳句，但不能将他们称为塞上诗人。而唐时的李益可以说是塞上诗人，因为他出生在甘肃，但他北游河朔，在塞上的幕府度过约二十年的时光，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北宋的张元可以说是塞上诗人，他是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西夏立国前投奔西夏，官至国相，现只留二首诗和两个残句。元代诗人王翰生于1333年，先祖为西夏人，世居灵州。王翰十六岁袭职千户长镇庐州（今合肥），后又升为庐州路治中、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等，明洪武十年（1377），王翰决心不事二主，引刃自杀，卒年四十五岁。李佩伦认为王翰是宁夏诗人（《论元代宁夏诗人王翰》，《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4期），但其家族是“元灭西夏，入居内地”，那么王翰是在西夏灭亡六年后出生的，肯定出生在内地，所以把王翰说成安徽诗人或福建诗人均可，但说成宁夏诗人有所牵强。直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棣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册封为庆王。他在韦州城（今宁夏同心韦州镇）居住了九年，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负责镇守塞上疆土。在宁夏城（今银川市）居住三十六年，直至病逝。创作了大量的诗作，编纂《宣德宁夏

志》。林季芳、唐鉴、陈德武、胡官升、李守中、潘元凯、承广、郭原等诗人或谪戍或流寓宁夏，而王用宾、释静明、朱秩炅、夏景芳、朱平斋、胡汝砺、胡珪、骆用卿等为宁夏本土诗人，保绩、冯清、陶希皋、杨守礼、石茂华、罗凤翔、萧如熏、黄嘉善等诗人或为宁夏巡抚或为总兵。清代的宁夏诗人就更多了，黄图安、刘芳猷、常星景、俞益谟、岳咨、俞汝钦、幻闻、朱亨衍、胡秉正、方张登、黄恩锡、顾光旭、王赐节、张映梓、黄璟、徐保字、张梯、郭鸿熙、陈日新、朱美燮、赵惟熙、锡麟、韩庆文、张维岳等。

宁夏古代文学除了诗歌，别无其他，所以论述宁夏古代诗歌就代表了宁夏古代文学，或者说宁夏古代诗歌史就是一部宁夏古代文学史。宁夏古代诗歌的发展是渐趋兴盛的，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呈上升趋势，从秦汉时期寥寥几首到唐代的大量涌现，尤其是边塞诗蔚为壮观；经过宋夏元战乱的过渡时期，直接开启了宁夏明清诗歌的繁荣发展。宁夏古代诗歌既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又有古典传统的美学范式。

近代诗歌创作，是从传统的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的过渡，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处于中国西北的宁夏，相对来说依然比较宁静和保守，诗人创作的依然是古体诗词，几乎没有反映大的社会变革，他们都很有才华和能力，也展现出了他们的梦想和力量。与古代相似，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才俊被选派到宁夏为官，吴复安、杨巨川、叶超、张维翰、徐庭芝、段云、贾朴堂等诗人，无论是造福一方，还是诗歌创作，都为宁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宁夏近代的诗人为数不多，诗作传世也较为稀少，但这一血脉并未断流，虽纤细却一直流到现代，从而使宁夏的现代诗得到空前的繁荣。

宁夏新诗的发展与全国诗坛大格局的发展相一致，也经历了白话诗、朦胧诗和现代派诗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受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影响，汲取信天游、花儿、民歌等形式的营养，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宁夏的新诗有政治抒情诗，有以工农业为题材的诗，有歌咏西部自然的诗，也有纯粹个体化的现代诗。宁夏不同时期的诗人，其共同点在于以生活其中的西部为背景，表现了西部特有的苍凉和辽阔，既有饱含深情的吟咏，又有直抒胸襟的豪迈，更有出其不意的渲染和意象万千的泼墨。可以说，宁夏新诗在

表现内容和方式上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由于历代诗人推崇高尚的诗歌理念、继承传统文化的意义、保存诗歌活跃的氛围，才为宁夏诗歌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而使宁夏诗歌在发展历程中，不为潮流所惑，不为名利所诱，始终坚守着传统古典诗词的本质成分，始终行进在中国诗歌主流的发展历程之中。宁夏诗人将塞上大地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融入创作，为西部和中国诗歌的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日报》开办副刊《宁夏川》，宁夏文联创办《群众文艺》，都推动了新诗的萌芽。这一时期宁夏新诗的创作人员较少，以朱红兵、王世兴、姚以壮等为代表，主要从事信天游、花儿、民歌体诗歌的创作。这些诗人的作品大多以歌颂新中国成立后而呈现出的崭新面貌，以及翻身得解放的普通劳动大众对党的热爱之情。诗风单纯质朴，容易被大众接受。

由于宁夏属陕甘宁边区之一，一些在全国较有影响的进步诗人如李季、郭小川、王亚凡等先后来宁夏深入生活，并从事诗歌创作，留下了《阿拉善组诗》、长诗《银川曲》（合著）等作品，极大地带动了宁夏新诗的发展。其中以李季在盐池县创作完成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具代表。1957年，张贤亮的长诗《大风歌》在《延河》发表，引起全国反响。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从全国各地陆续来了一批支宁的知识分子，其中诗人中有早在30年代就从事新诗运动的李震杰、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过编辑的罗飞、辽宁诗人高深、北京诗人吴淮生等。其中，罗飞的《人的标本》、高深表现西部风情的《羊皮筏子》、秦中吟表现回汉人民热爱党的《金线银线五彩线》等作品，堪称那一时期宁夏的力作。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亚凡于1960年底下放宁夏农业第一线。他写道：“我要去遥远的塞北，/老红军把他的草鞋送给我，/他们那里山高又落雪，/无敌的草鞋会唱无畏的歌”（《友爱》）。王亚凡于1961年1月8日在灵武逝世，葬于灵武县烈士陵园，永远地留在了宁夏。196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由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宁夏第一本诗歌集《飘香的沙枣花》，将当时优秀的诗歌作品悉数收录。

70年代，肖川《唱在金秋》、吴淮生《不到长城非好汉》、蔡锦启《给

《大山通告》荣获宁夏第一届文艺评奖一等奖，李震杰、秦中吟、王庆、刘国尧、高琨、赵福辰、高深、邓海南等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宁夏文艺》上发表作品，并在宁夏第一届文艺评奖中获奖。宁夏诗人作品选《光辉永照宁夏川》于197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肖川逐渐成长为中国诗坛的一员骁将，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出版诗集《塞上春潮》，被誉为“塞上诗人”。吴淮生出版了诗集《塞上山水》。

80年代，肖川、刘国尧、高深、丁文、罗飞、马忠骥、杨少青、罗存仁等诗人的创作量多质优，少了些政治因素，多了些诗歌本质的成分。刘国尧《一号宿舍》入选《1949—1979诗选》。肖川《中年的船，没有港湾……》入选《中国新诗年编》，肖川因创作成就突出，被宁夏党委、人民政府授予“宁夏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罗飞《人的标本》入选《1982年诗选》。80年代后期，导夫、薛刚、权锦虎、杨云才、刘中等以《宁夏青年报》为阵地，他们的作品被半个版地推出，为宁夏诗坛带来不小的震动，为宁夏“60后”诗人集体亮相起到了表率作用。荆竹曾说：“《宁夏青年报》在领导宁夏诗歌新潮流。”而杨云才一出手就在《民族文学》《诗刊》等发表诗作。

90年代，肖川、罗飞、吴淮生、屈文焜、马钰、柳风等诗人坚持创作，60后诗人集体亮相。他们可以分为两个诗群，即西海固诗群和川区诗群。西海固诗群是围绕六盘山和黄土高原这一区域进行创作的诗人群体，他们相对独立地行走于六盘山的周围，坚持本土化的写作立场，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优秀传统文化，写出了大量既有较深思想内涵又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诗作。概括来说，西海固的诗歌呈现出本土化、民族化和传统化三大特点。代表性诗人有虎西山、梦也、冯雄、王怀凌、张铎、唐晴、周彦虎等。川区诗群是围绕贺兰山和河套平原这一区域进行创作的诗人群体，他们敢于打破经营多年的创作模式，打破业已形成的风格，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有所借鉴，似乎一直在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创作之道，具有探索性、现代性和口语化倾向，代表人物有杨森君、贾羽、杨云才、刘中、洪立、米雍衷等。而杨梓开始创作《西夏史诗》，邱新荣以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是抒情史诗和历史抒情诗，与两个地域性诗群有所不同。宁夏诗人的作品纷纷进入了全国诗选，罗飞、杨梓、高深的

诗作入选《中国诗歌年鉴 1996 卷》，高深、刘国尧、罗飞、吴淮生、肖川、杨梓的诗作入选《新中国 50 年诗选》。此后，宁夏诗人入选全国选刊选本不胜枚举。1999 年，杨梓发表的系列《西夏史诗》受到《诗刊》的关注，应邀参加诗刊社第十五届“青春诗会”，是宁夏第一个参加该会的诗人，自此由地方走向全国。

进入 21 世纪，宁夏 60 后诗人全面崛起，70 后诗人紧随其后。首先是《诗刊》2001 年 8 期在头条位置“每月诗星”栏目推出杨梓的个人作品专辑，《诗选刊》2001 年 11 期在“中国当代诗人问答录”推出杨梓的《答〈诗选刊〉21 问》。《十月》推出“西海固的诗”；《诗潮》《星星》《绿风》《中国诗人》《西部·新世纪文学》《扬子江》《诗歌月刊》等先后推出“宁夏诗人作品专辑”。《朔方》大力推举本地作家、诗人，在“本期一家”栏目先后推出王怀凌、梦也、虎西山、杨森君、洪立、泾河、杨建虎、林一木、单永珍、冯雄、安奇、马占祥、李壮萍、张不狂等诗人的作品专辑。他们的作品纷纷亮相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十月》《绿风》等，并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出版一部或几部个人诗集。多次荣获宁夏文艺评奖诗歌奖。杨梓具有历史化、民族化、古典化创作倾向；杨森君从心象化创作走向西域；单永珍具有民族化、地域化创作倾向；邱新荣具有历史化创作倾向；虎西山、洪立具有传统化创作倾向；王怀凌具有本土化创作倾向；梦也、米雍衷具有心象化创作倾向；冯雄具有风格化创作倾向；张联具有题材化创作倾向等。杨梓的《西夏史诗》、杨森君的《西域诗篇》先后列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项目。2006 年，单永珍应邀参加“贺兰山·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宁夏 60 后诗人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互相的差异性较大，这就丰富了宁夏诗歌。但也有自我重复的现象，缺乏突破和创新，尤其在语言和语境上有模式化的倾向。或许与宁夏的地域有关，一方面宁夏并非经济前沿地带，他们的创作与经济没有多大关系，同样与全国的诗潮也关系不大；但另一方面宁夏地处西部，又无形地遮蔽了他们的视野。

宁夏 70 后诗人虽一度“前有 60 后强敌、后有 80 后追兵”地被遮蔽一时，但他们最终突出重围，浮出历史地表。他们以其丰硕的战果成为宁夏诗坛不可或缺的力量。郭静以安静为姿态进入他的地理，并发出优

美的歌吟；安奇的古典、边塞和文人情怀三位一体，营造着他的多愁善感；张不狂的日常化、口语化、散文化的尝试，写出逼真的生命感受；杨建虎的诗以美丽、安静、温情的罗曼蒂克的气质代表了西海固诗歌的另一幅面孔；阿尔接近现实，接近真实的个人写作，是一种自由的敞开的表达式的诗歌写作；谢瑞以城市为题材，其诗是从这个空间内部生长出来的，带着城市内在的隐秘和对人的捆绑；刘乐牛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他念念不忘自己所由来的乡村，一直在回忆他的爱情。还有唐荣尧的柔情而豪迈、刘学军的本土与风骨、林混的口语和精练、孙志强委婉中的跳脱、西野平淡中的奇思等，这些 70 后诗人风格迥异，不仅壮大了宁夏诗人的阵容，也丰富了宁夏诗歌的创作。2012 年，马占祥应邀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

宁夏 80 后诗人刘岳、王西平、李兴民、张虎强、屈子信、王佐红、秦志龙、许艺、火禾、田鑫、十画、刘京等，90 后诗人石杰林等，较为优秀，一直在坚持创作，让我们看到宁夏诗歌的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 1958 年，主要回族诗人王世兴、高深、马乐群、杨少青等，他们以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题材，以高昂而明快的政治抒情诗和“花儿”抒情诗为主，把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表现出一个回族诗人坚忍顽强的性格和正气凛然的风骨，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他们与汉族诗人一起，成为塞上大地现代诗的并肩拓荒者。王世兴《莲滩》（长诗）和高深《致诗人》荣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80 和 90 年代，马钰、沙新、何克俭、马忠骥、井笑泉、杨云才、丁学明、尹乔等回族诗人纷纷活跃，使宁夏回族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回族诗歌创作群体。沙新《祖国，请为他们记功》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二等奖，杨云才的《大西北恋歌》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新人新人作奖，高深《大漠恋歌》（诗集）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杨少青《大西北放歌》（诗集）荣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以贾羽、李春俊、杨云才、雪舟、单永珍、马占祥、泾河等为代表的宁夏 60 后和 70 后回族诗人，不但在宁夏颇具影响力，而且在全国诗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主要以西部和宁夏为背景，着力描写人的生存环境、生命